

第一辑

社论、评论员文章

不要蛮干

《人民日报》社论

沟通祖国西南和西北的宝成铁路在 7 月 13 日接轨以后，素称“天府之国”的四川将通过这条铁路同全国各地紧密联接起来，从此蜀道不再难，人们不禁为这振奋人心的消息感到欢欣鼓舞。然而，接轨时间过去一个多月了，宝成铁路沿线却发生严重病害，施工单位正在大力组织整治。人们在为这个铁路建设的巨大胜利庆幸的同时，也就不能不发出这样的疑问：宝成铁路是不是出了问题？既经接了轨又为什么回过头来“整治病害”？

现在，我们摘要发表一封来信在这里。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接轨前夕宝成铁路工地的一些情况。

6 月份，宝成铁路不断受到雨水冲击，沿线连续发生塌方现象。6 月 15 日，南段又发生 8000 多方塌方，塌下的孤石最大的约有 600 多方，影响了黄沙河接轨任务。6 月 16 日下午 18 时，第二工程局第十二工程段为了保证“七一”接轨，竟不顾施工规则中“搬运和安装炸药时，必须把全部工人撤出工地，由专门人员进行爆破”的规定，由爆破队、隧道十三中队和钉道队三个单位，组成了一个 200 人的大抢方队，同时进行抢救、打眼、运炸药等工作。正在紧张施工中，山上孤石移动，防护瞭望人员虽然发觉了，但因工地人多，缺乏统一指挥，已经来不及撤退所有的工人。孤石从山上滚下来，击中一箱炸药，引起爆炸，当场有 43 人受伤，其中 5 人伤重死亡。

发生这件惨痛的事故决不是偶然的。“七一”接轨，这个愿望当然很好；至于有没有可能，当初提出这个口号是否正确，现在也没有根据断言。但是从6月份的情况来看，由于地质情况复杂，塌方严重，再加上洪水为害，给施工增加了许多困难，“七一”接轨已经是不可能的了。在这种情况下，铁道部虽然发过电报，指示过不必强求“七一”接轨，但有关单位没有采取具体措施，坚决贯彻执行，结果还是突击施工，以至事故累累，工程质量低劣。

这是一种要不得的蛮干作风。虽说宝成铁路的艰巨性是全国罕见的，比起最初的计划来，建设时间大大提前了，成绩是很大的。但是，人们如果对于宝成铁路用蛮干的办法强求“七一”接轨，提出正当的责难，却并不过分。

类似这种明明不可能、却要蛮干的作风，在工业交通建设和工业生产中还是相当普遍的现象。挖土方必须留足坡度，不让土石滚下来，这在技术操作规程上早有明文规定，也是尽人皆知的常识。然而北满钢铁建设公司一工地的工长，为了急于完成任务，追赶工程进度，当土方工程挖到7公尺深的时候，还不让留坡度，工人发现土壁东头掉落土块砸断跳板，从坑里跑上来的时候，工长竟怒气冲冲地强迫工人下坑工作，结果不到几分钟，土壁塌陷，发生了伤亡事故。同样，湖南资兴煤矿，明知储煤槽下部存煤已经挖空，不能再挖，但为了完成620吨煤的装车任务，领导人竟指挥工人用挖“神仙洞”的方法去挖煤，结果也发生了事故。青岛四方机车车辆制造厂的蒸汽吊车，每次只能吊竹节钢一吨，生产指挥人员为了赶任务，竟命令工人两次吊完10吨竹节钢，结果吊车吃不住，翻倒了，造成了不幸的事故。也有的地质勘探队，事先没有妥善地解决水的问题就贸然向沙漠进发，甚至在通过两壁悬崖之间的独木小桥的时候，也不采取安全措施，结果遭受不必要的损失。被许多企业当做完成计划的法宝的加班

加点，更是一种普遍的蛮干作风。

对于这些蛮干现象的指责，有人却大不以为然。他们动辄以两万五千里长征如何如何艰苦，志愿军在朝鲜如何如何英勇，作为例证，要求工人加班加点，要求工人“宁走一步险，不走十步远”。当然，两万五千里长征和中国人民志愿军的英雄事迹，在人民心头永不磨灭，它给了我们以无限的战胜困难的力量。但是，继承两万五千里长征的光荣传统，学习志愿军的英雄榜样，是不是就应该提倡蛮干呢？显然，完全不应该。我们的工业交通建设和工业生产是和平的建设，和平的生产，一般说来，这已经没有冒险，更没有牺牲生命的必要了。摆在建设事业面前的，已经不是武装敌人的堡垒，而是科学技术的堡垒。我们所需要的已经不是流血牺牲，而是刻苦钻研。不承认这个事实，硬把不光彩的、粗暴的蛮干作风，同长征的艰苦和志愿军的英勇相提并论，这是荒唐的。

有人说：“要加快建设速度，提早实现社会主义，总得采取非常措施，循规蹈矩怎么行？”言下之意是：蛮干虽不好，但是事出有因，迫不得已，因而总还是情有可原的。循规蹈矩好不好呢？这要看循什么规，蹈什么矩。循保守之规，蹈落后之矩，当然不好；但科学的规矩，却是非循不可、非蹈不可的。非常措施好不好呢？这也要看是什么样的非常措施，蛮干之类的非常措施，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它实在没有什么好处可言。

我们的工人都是些建设社会主义的最积极的战士。每一个企业的领导者都应该珍惜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把他们的热情引导到科学作业的轨道上来。当有了正确的领导的时候，群众的这种积极性就可以得到最充分的发挥，获得更大的效果。否则，一味蛮干，逞一时之能，图一时之快，最后必然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给国家的建设事业带来不利的后果。

（原载 1956 年 9 月 1 日《人民日报》）

评析：

一片叫好声中的批评

1956年，全国人民正以高昂的热情投入新中国的建设中，为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的各项任务而努力奋斗，各地各行业捷报频传。但在生产和建设中，因不讲科学，只知蛮干，也发生了不少事故，造成了不应有的伤亡和损失。社论及时提醒人们：不能蛮干，要尊重规律。

新闻评论经常从解剖典型入手来立论，社论（不要蛮干）也不例外。而按照常理，批评性的评论应抓一个反面典型解剖，但此文所抓的却是一个正面典型。宝成铁路建成后，结束了“蜀道难”的历史，叫好声一片。但作者从“接轨过去一个多月，施工单位还在大力整治铁路沿线病害”这一事实中发现了不顾客观规律，盲目抢工期所带来的不良影响，进而对其中暴露出的蛮干作风进行了批评。也因其是一片叫好声中的批评，就显得格外尖锐，格外引人注目，充分发挥了社论应有的“根据当时形势，围绕党和国家中心任务，结合实际，澄清是非，指导实践”的作用。

“要加快建设速度，提早实现社会主义，总得采取些非常措施，循规蹈矩怎么行？”这是当时很有普遍性的思想，也是导致蛮干的病根。作者针对这种观点指出：蛮干一类的非常举措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科学的规矩非循不可。这种观点和议论，不仅在当时切中时弊，振聋发聩，即使今天读来也给人许多启迪。为了向什么特别的日子献礼盲目抢工期，以致酿成重大工程事故、造成巨大经济损失的事，这些年来一直没断过。人言新

闻评论是“速朽”的东西，但《不要蛮干》却并没有因“时过”而“过时”。这对文章来说确实是一种幸事——因其思想具有极强的生命力，但对社会来说就是一种不幸了——因其所言的问题一直在延续。

不要害怕反对的意见

《人民日报》社论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强调地提到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问题。为了有效地逐步消除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弊害，我们认为有必要谈一下对待反对意见的态度问题。

扩大党内民主是使党的领导工作符合于客观实际的重要方法之一。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关于党员的权利和党的民主集中制的各项规定，都充分地体现了扩大党内民主的精神。新党章规定，党员有权在党的会议上或者在党的报刊上参加关于党的政策的理论和实际问题的自由的、切实的讨论；党员可以对工作提出建议，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的任何组织和任何工作人员；对于党的决议如果有不同意的地方，除了无条件地执行以外，党员可以保留和向党的领导机关提出自己的意见，下级组织可以请求上级组织改变决议。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也指出：要“善于听取同级的和下级的不同意见，善于在党的会议上和党的报刊上组织关于政策问题的自由、切实的讨论，在纪律许可的范围内允许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允许下级向上级提出异议。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有生动活泼的党的生活，我们的领导才不致犯了错误而不能及时地改正。那种脱离群众、脱离集体、听不得反对意见、用机械的服从来维持领导威信的办法，只能妨害我们的事业的发展。”

对于我们许多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组织的负责人来说，重视自己认为是正确的意见和多数人的意见是比较容易做到的；重视自己认为是不正确的反对意见和少数人的意见，就不那么容易了。有些党的领导机关和党组织的负责人，在讨论问题制定决议的过程中，常常不是有意识地组织、启发各种不同意见展开充分的讨论，不是有意识地使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有充分申述自己主张的机会，而常常是用领导者的意见去轻易否定反对意见和少数人的意见，甚至用粗暴的态度去压制坚持反对意见的同志。这种作法和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的文献所强调的扩大党内民主的精神是相违背的。

有些领导工作人员所以不重视反对意见甚至不允许发表反对意见，是因为他们没有真正体会到这样做的好处，他们还认为这样做会有很多害处。他们忘记了，没有不同意见的自由讨论，就不可能有什么集体领导。

有些同志害怕争论会引起党内思想的不一致。这种顾虑其实是不必要的。对于即将着手解决的问题，需要大家有一致的认识。但是，一致的认识从何而来？每一个人的工作岗位、经历、经验、思想政治水平，以及对要解决的问题所掌握的情况都有不同的地方。党委的书记虽然一般地在政治上是比较成熟的，但是这并不能保证他的意见经常正确；实际上，意见永远正确的人是永远也不会有的。领导者在政治上愈是成熟，就应该愈懂得集思广益的必要，就应该愈懂得保持谦虚谨慎态度的利益和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危害。而且，即使党委的书记对某一个问题的意见是完全正确的，如果不得到多数委员的同意，他的意见仍然是行不通的；如果勉强去行，工作也还是会受到损失。何况任何个人的意见总不免有不周到的地方呢？因此，作为一个领导者，就不能把事情设想得那么简单，要求大家的认识一开始就会完全一致。聪明的领导者，应该像刘少奇同志在政治报告中所说的那

样：“容许不同观点的无拘束的争论，以便比较全面地反映党内外群众的各种意见，也就是比较全面地反映客观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各个侧面。”只有这样，把不同的情况和不同的观点都提出来，展开争论，让正确的去说服错误的，让不全面的得到补充修正，而后才能求得比较符合于客观实际的比较全面的认识。如果领导者坚持用个人的意见或少数人的意见去强制多数人服从，这就很难得出符合于客观实际的全面的意见，也就很难真正统一思想认识。这样，工作中的意见分歧在最后不但不会减少减轻，而且必然加多加重。

在不同意见进行自由讨论的过程中，首先需要重视多数的意见，因为多数的意见一般是比较正确比较全面的。但是也需要适当地重视少数的意见，也需要让少数的意见尽可能得到畅所欲言的机会，并且受到认真的考虑。为什么呢？第一，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有时候，少数人的意见也会是正确的。河北省昌黎县委会讨论今年农业增产指标的时候，大多数县委委员主张每亩增产到 600 斤（超过去年产量的 100% 以上），只有个别同志不赞成这个指标。县委会再三考虑了少数人的意见，又研究了典型调查资料，终于否定了多数委员原来的意见，而按原来是少数委员的意见把增产指标确定为 350 斤。以后的事实证明，这个指标是符合实际的。由此可见，认真地对待少数人的不同意见，在有些情况下可以使党避免错误。第二，少数人的意见虽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不全面的，或者是不正确的，但是，这些意见对党也有好处。正确的意见在同错误的意见争论的过程中可以发展得更加周密、完善，根据更为充分，片面性更为减少，同时还可以更多地预见到实现这些主张的过程中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和障碍。特别是当大家集中力量在反对一种倾向的时候，有些同志的脑子很容易发热，这时候，如果有少数人从反面提出一些不同的意见，对于我们防止偏差减少错误，尤其有重要

的意义。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正确的意见是决不怕别人反驳的，只要意见正确，经过辩论就更容易被人接受。只有错误的意见才害怕辩论，因为辩论就要暴露它们的弱点。

不仅在制定决议的讨论过程中要允许不同观点的自由争论；就是在制定决议以后，党也还允许个别的党员保留和向上级组织提出自己的不同意见，允许下级组织向上级组织提出异议。党所以要用这样高度的民主精神来对待反对的意见，目的在于使党更容易避免错误。这一点，邓小平同志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作了很好的说明。他指出：“只要党的决议是正确的，这些持有不同意见的党员又是愿意服从真理的，他们终于会心悦诚服地认识党的正确和自己的错误。如果真理最后被证明是在少数方面，那么，保护少数的这种权利，也可以使党更容易地认识真理。”当然，党员和党的下级组织对党的决议提出不同意见，必须是在党的纪律许可的范围内，就是说，保留意见的党员仍然必须执行党的决议；他的意见必须按照党章所规定的程序提出，不允许向党外去宣传；而对于请求上级组织修改决议的下级组织来说，当上级党组织认为仍然应当执行原决议时，下级组织就必须无条件地执行。党允许提出不同意见，但是决不允许擅自不执行党的决议。不然，就不能保证党的行动的一致。

这里，还应该谈到对待提出反对意见的同志的态度的问题。如果反对意见是错误的，党组织和它的负责人要对持有这些意见的同志进行耐心的说服教育。用自由主义的态度对待错误的意见是不对的，是非应该分明。但是，只要提出反对意见的同志没有违反党的纪律，就不应该用纪律去威胁他们或者“处分”他们；如果那样，犯纪律的就不是提出反对意见的同志，而是滥用权威去侵害党员权利的人了。对于在正常情况下对于党的日常工作提出不同意见的同志，应该是照常亲密无间地同他们和睦共事，决不应该有任何歧视、排斥以至打击的行为。我们已经说过，提出

不同意见甚至坚持不同意见的同志不一定是错误的；而且，即使下边同志的意见是错误的，也不应该用这种态度去对待他们。如果要求党员和下级组织只能提正确意见，那实质上就是压制民主，就是不让大家提意见，因为很少有人敢说他提出的同上级不同的意见一定是正确的。

有些领导者不大喜欢那些有独立见解的干部，认为他们组织性纪律性不强，不好领导。这是不正确的。他们把那些在上级面前唯唯诺诺，看领导者的脸色说话行事的人，那些随声附和、从不坚持意见、甚至从不公开表示自己主张的人，当做组织性纪律性“强”的人。这当然是对党的原则的一种曲解。共产党从来是提倡独立思考的。只有独立思考，才能真正认识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和所担负的责任，高度自觉地进行工作。相反的，如果自己明明不同意而硬表示同意，明明有意见而硬装着没有意见，或者对别人的意见不加思考，不管对不对盲目跟着走，这同我们党所要求的组织性纪律性并没有什么共同之处。如果一个领导者把自己所领导的干部都“培养”成这样一些庸人，那就绝对不可能做好他所领导的工作。优秀的领导者应该积极培养工作人员独立思考的能力和习惯，以及坚持真理的勇气。因为只有这样的工作人员，才能够有效地为实现党的主张和坚持党的原则而斗争。

也有极少数的领导人员害怕争论、害怕不同意见，是因为他们把个人的“尊严”看得重于党的事业的利益。他们怕别人提出不同的意见会显得自己不够高明。有些人甚至要求别人用“老爷说的准没错”的态度来对待自己的意见，谁要是对他们提出不同的意见，他们就说谁是不尊重领导，破坏领导“威信”，就用粗暴的态度和违反党章的手段来加以打击。他们不知道，领导者的威信只能是领导正确的结果。如果不肯倾听领导的意见，如果压制群众的正确意见，就不可能有正确的领导，也就不可能有什么“威信”。任何建基在沙滩上的假威信，终久是要垮台的。

毫无疑问，党要求扩大党内民主，要求领导者正确地对待反对的意见，决不是说可以把原则问题的争论变成无原则的争吵，把对工作问题的讨论变成无休止的清谈。但是，同样没有疑问的是，防止这种偏向的办法不是禁止不同意见的正当的讨论，不是压制反对意见，而是加强对党内讨论的领导。因噎废食，怎么能说得上是党所需要的正确的领导呢？

（原载 1956 年 10 月 9 日《人民日报》）

评析：

把大道理磨碎了说

1956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编年史上极可纪念的一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许多重要指标提前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取得决定性胜利，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八大”确定，全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并相应制定了各项政策。其中，扩大党内民主，防止个人崇拜，占有突出地位。社论《不要害怕反对的意见》集中论述了党内民主中的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怎样对待反对意见，它击中了某些领导干部身上的一个致命弱点——轻易否定反对意见，甚至用粗暴的态度压制提反对意见的同志。

社论（不要害怕反对的意见）的理论色彩很浓。无论是第五自然段对“有些同志害怕争论会引起党内思想不一致”的分析和论述，还是第六自然段对“需要让少数人的意见尽可能得到畅所欲言的机会”的分析论述，都具有强烈的思辨性。但作者不是用大道理压人，而是把大道理磨碎了说，比如在谈到要重视少数人的意见时，作者指出：一、少数人的意见也会是正确的。二、听

听少数人的不正确意见也有好处。三、正确的意见在同错误意见的争论中会更周密。四、正确的意见不怕人反驳。因大道理被掰开了、磨碎了，所言之理也就具体了。而具体的理，才是最易被人接受的理。

理论是对大量实践“加工”后得到的规律性认识。如果理论是正确的，就能帮助人们正确预测未来。否则，分析论述就易犯任意揣摩、以偏概全的毛病。但有了理论还需会说理。学习《不要害怕反对的意见》如何说理，对今日写评论不无教益。

假如都像徐永山

《中国农民报》评论员

看了《徐永山和他的拖拉机》这篇报道，使人十分高兴。

油是最宝贵的能源。现在，全国的农业动力机械已经有了 1.8 亿马力，其中 1.3 亿是用油的。农业生产一年要用 800 多万吨柴油，是消耗柴油最多的一个部门。

按规定，耕一亩地用的油，不能超过 0.8 公斤。不少机车超过了 1 公斤，而徐永山只用 0.65 公斤。

按规定，耕一亩地，机车的修理费不能超过一角五分钱，而徐永山只要一分一厘。

按规定，耕一亩地，作业成本不能超过八角钱，有的地方超过了一元，而徐永山只要四角三分五。

按规定，拖拉机工作量达到 5 万亩就得大修，大修一次得花三四千元，而徐永山的拖拉机工作量已达 11.7 万亩，还不用大修，机车保持了良好的技术状态。

所有这些，没有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和技术水平，是根本办不到的。

高消耗不可能有高速度。搞四化必须精打细算，努力降低消耗，增加收入，这是搞四化最实际的行动。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我们该不该学习徐永山？大家都该认真想一想：

假如都像徐永山，一台拖拉机一年节省柴油一吨半，单是

60万台大中型拖拉机，一年就可以节省90万吨柴油。

假如都像徐永山，一台拖拉机一年节省修理费1500元，全国就是9亿多元。

假如都像徐永山，一台拖拉机一年少开支费用2800元，全国就可以为农民节省20多亿元。

假如都像徐永山，十年如一日，精心保养操作，全国200多万台拖拉机，就可以一台顶一台、甚至顶两台用。

假如我们不能把高消耗压下来，不讲经济核算，不讲经济效益，那四化就没有希望。假如都像徐永山，实现四个现代化就大有希望，时间也可以大大提前。

（原载 1980年4月20日《中国农民报》）

评析：

妙用数据

评论员文章除了以独立的形式发表外，大多数都是依托有关典型或配合重要报道结合形势任务而发。《假如都像徐永山》属于后者。文章揭示了徐永山节约能源和费用的巨大意义。

全文共分14个自然段，有9个自然段运用了数据来说明问题。其方法又分为两类：一是对比。在文章的前半部分，接连4个“按规定……”的排比句式中，作者如实列出了农机在农业生产中应用多少油、多少钱等，又如实列出了徐永山只用了多少油、多少钱，这样一比，徐永山的可贵之处及价值便得以充分显示了。二是推演。在文章的后半部分中，接连4个“假如……”的排比句式，由小及大，使人产生了大吃一惊的感觉，并自然而然地得了结论：确实应该学习徐永山！

算账，是说理的一种方法。它通过对事物数量的分析、描述、推导、计算，揭示其本质、规律及意义。算账当然少不了数据，但数据若运用不当，则会让人感到枯燥，故而大量运用数据一直是新闻评论写作之忌。不过要运用的好，则会使文章具有不容置疑的说服力，《假如都像徐永山》是一个成功范例。经过巧妙组合，恰当安排，数据与说理融为一体，让人吃惊之余很自然地接受了文章的思想。